

# 鳌峰书院，福建百年教育名片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将全国各大书院改制成大、中、小三级学堂，存续1300多年的书院制度戛然而止。全国1600多所书院纷纷转型改制，当年象征科教鼎盛、闽学昌达的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亦不能固守孤城。

伴随着鳌峰书院昔日风华的陨落，这座存续198年的建筑也在1911年的一场烟火升腾中灰飞烟灭，仅剩假山一座。蔡璧、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33位书院山长和林则徐、梁章钜等众多品学兼优的福建士子的身影，在一代王朝的背影里四下散去。

今日的鳌峰书院于2010年重建。重建主体为与书院原址紧邻的李世甲故居，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约为原建筑面积的十九分之一。走进书院大门，穿过花木扶疏的前厅，便能望见正厅上方高悬的两块匾额，一块是康熙五十年康熙皇帝御赐的“三山养秀”匾，另一块是乾隆三年乾隆皇帝赠御书“澜清学海”匾。建筑前部按福州清代建筑结构重建，后部则在保留李世甲故居民国西式建筑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修缮。

原先“秀分鳌顶”“灵对九仙”“讲院临流”“鉴亭水”“方池鱼跃”“丛树鸟歌”“奎章眺远”“仙井斗奇”“交翠迎风”“暮盘玩月”的旧日十景，以及大成殿、文昌阁等134个房间的面目，早已无法索骥。与它们相关的故事只能在史料中寻觅。

## 鳌峰书院创建伊始 独具浓厚的官方和理学色彩

康熙年间，清政府对书院的态度由之前的忌讳转为扶持，遂于全国各地倡导理学，遍设书院。康熙四十六年，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是程朱理学笃实的尊崇者与推行者，所至必延名儒，兴庠序。

张伯行在《鳌峰书院记》中称：“闽中素号海滨邹鲁，盖自龟山载道而南，三传至孝亭，而濂、洛之学大著，其渊源上接洙、泗，由宋迄今，闽士蔚兴，与中州埒。”阐述了理学传入福建之学统，抒发闽学蔚为风气之感概。张伯行称创办书院旨在“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濂洛关闽之学”，“民间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尤当萃而教之，以成其器，为国家储用者也”。

据《鳌峰书院志》记载，张伯行“甫下车，即开鳌峰书院”。书院创建之初，张伯行个人出力甚多，“捐俸购屋于九仙山之麓，葺而新之”。他看中位于九仙山(于山)北麓的明朝巡抚邵捷春故宅，初时计有“厅、房、楼、台共六十四间，并池、亭、假山”。“前建正谊堂，中祀周、程、张、朱五夫子，后为藏书楼，置

经、史、子、集若干橱；其东则有园亭池榭、花卉竹木之胜。”书院依照邵捷春故宅旧格局进行修葺、更新，继而复购民房及尼庵拓而广之，故在张伯行时“书舍共一百二十楹，庖次并饮咸具”。

藏书是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张伯行购置经史子集书籍共460部，又“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搜求闽地先儒遗著，手自刊校，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部，刊成五十五种”。刊刻著作历经战乱，多有散失，“藏版蠹蛀无遗”。同治五年，左宗棠莅闽，设正谊书局，访得遗稿，补成全璧，历三年竣工，增至68种，定名为《正谊堂全书》。

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发布在全国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鳌峰书院被确定为福建省城书院。之后历任巡抚、总督都不断完善这所富丽宏大的教育殿堂的营造与规制。至嘉庆十一年，扩建后的书院计有藏书楼、监院公廨、正谊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考棚等教学、办公设施，学舍共130多间；专设有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等祭祀场所；有荷池、鉴亭、假山等园林胜景。书院藏书浩繁，达1020多部，28240多卷；藏板遗失不少，尚余13种，9000多块。道光二年，又重修增设堂、室、考棚等。书院占地12600多平方米，其间屋宅毗连，书架壁立，树色联缀，曲院风荷，是精致秀美的园林建筑群，也是培识修慧的清修之地。

## 鳌峰书院的营建 得到各方鼎力推毂

运转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官府设法予以供应完善，来源为朝廷赐银，地方拨银，省、府、县各级官吏捐银及田租、园租等。另一部分则来自社会捐助。

雍正十一年，朝廷赐帑银2000两。乾隆三年，又赐帑银2000两，生息以资膏火。

地方则于乾隆二年、乾隆十七年、乾隆二十一年分别由地方司、道拨银1980两、2000两、1100两；自康熙四十六年始，为保障经费供应，总督、巡抚往往带头捐俸，以下各级官员照例而行，比如有一项惯例：自督抚以至守令，每养廉百两，捐银一两。这个惯例一直实行到嘉庆四年。

嘉庆二年，浦城职员祝乾封、祝缔封将长兄祝荣封遗产银5000两、稻谷1984石4斗，捐与鳌峰书院以充膏火。

为体现对最高学府的重视，每任总督、巡抚、学政等，都要带头定期到鳌峰书院讲课倡学，或举办重要祭奠活动。平时的主持管理则由山长执行。山长之职最初规定，应由督、抚就本省或外

省人中，择品学兼优者礼聘之。道光年间又下谕旨：须在省籍中择有声望的绅士为山长。从此，山长一概由在籍绅士充任。

学生入读书院的门槛和要求极高。每年二月初，书院开始向全省招生。每年报考生徒有五六千人，录取名额仅350人左右。录取的学子有“日给廪饩，岁供衣服”的待遇，但考核也赏罚分明，极为严苛，每个月要接受3次考课。初六、十六馆课，“由山长主持，高坐堂皇，命题宣讲，或讨论经文，或演绎济世之学，诸生环列侍听，肩背相望”。而每月廿六的官课，“自督、抚两院，藩、臬两司，粮、盐两道并福州府以次轮流”主持举行甄别考试。精研学业成绩优异的学子在考测评定后，按等次颁发不同的奖学金。考课一次无故不到者，罚扣半月膏火及饭食银两，两次者扣全月膏火及饭食银两，三次者除名。严格的章程规范，使得所有学子要想顺利毕业，只能痛自鞭策，忧勤惕厉。

## 高成才率巩固书院 省级文教中心的地位

《鳌峰书院志》自康熙四十六年开始的科考名录显示，由康熙壬子科至嘉庆乙丑科短短130多年的历科乡试中，鳌峰书院共考中850名举人，进士人数达到250人，而清代福建全省仅有进士1700人，约占七分之一。

这些成果除了学子自身的禀赋努力，也离不开开学问博洽的良师辅弼。书院历任山长均为贯通古今、造诣深远的硕学通儒。其中有理学名家蔡璧、蔡世远父子，著名古文学家朱仕琇，“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朱子为归宿”的著名学者孟超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郑光策，经学名家陈寿祺等人。

林则徐14岁考中秀才，20岁考中举人，其间在鳌峰书院求学7年。他师从陈寿祺、林春溥、郑光策等巨擘泰斗。陈寿祺是诗书继世、翰墨传家的名家，曾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又任记名御史、国史馆总纂，后于鳌峰书院任山长11年，为《福建通史》总纂。陈寿祺是林则徐的老师兼知己，两人常于学术和政治上切磋琢磨。林春溥授翰林院编修，后主讲福州鳌峰书院19年。林则徐曾向其学清书(满文)。郑光策以“经邦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强调“绩文之源”，探究“为民兴利除害”的社会革新。至道光时期，林则徐逐渐成为全国经世致用派(亦称社会改革派)的引领人物。

而郑光策又是梁章钜的老师兼岳父。梁章钜14岁入鳌峰书院，经史文墨卓绝超群，孜孜不懈用心沉着，生平

著书70多种，林则徐认为“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梁章钜与林则徐、杨庆琛、廖鸿荃皆为同学，经常切磋砥砺，颉颃互竞。

人们熟知的弟子还有陈若霖、陈化成、张际亮、蓝鼎元等。他们或能济世匡时，或为硕学通儒，或发展出杰出的艺术天分。清朝的福建文化名人几乎都能在鳌峰书院找到有序而错综的传承关联，其人渊源之誉实至名归。

## 借由书院 闽学得以传薪台湾

前台大教授张正藩指出：“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这些书院在建筑风格、组织结构、章程规制上均与福建一脉相承，尤其在鳌峰书院可以找到渊源脉络。

台湾宜兰的仰山书院(以宋龟山为闽学之宗，而兰之海中，亦有龟山屿，故名仰山，志景行也)。“仰山”意为景仰杨时(龟山)，传承闽学。陈寿祺主持鳌峰书院时为厘清宿弊而制定的《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拟定鳌峰书院事宜》等学规被仰山书院因循沿用，奉为办学圭臬。道光六年，福建巡抚孙尔准赴台巡视，从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史记》《诸葛武侯集》《二程文集》《朱子语类》等共45种166部图书给仰山书院，“以为诸生稽览之资”。

福州闽县人薛士中师从张伯行就读鳌峰书院。雍正、乾隆年间，他两次出任台湾府学教授，首任海东书院山长，并在该书院讲学达6年之久，并亲定院规。台湾府治(今台南县)的海东书院，按鳌峰书院规制设立，被清政府定为省级书院，为台湾最高学府。

鳌峰书院山长丁莲曾受邀至台湾讲学，“倡明经术，海外化之”。鳌峰书院优秀学子蓝鼎元学成后，赴台振兴当地的政治、经济、文教事业，被康熙赞为“筹台宗匠”。鳌峰书院也吸收优秀台湾人参与管理教学。《台湾通史》记载嘉义县优贡陈震曜，“历署建安、闽清、平和、莆田、后及“监理鳌峰书院，助修通志，访刻先儒遗书”。因为直接招收台湾学生，鳌峰书院中来自台湾的推崇慕习者众。

在建设经营、师资招聘、藏书刻书、生童管理等方面，鳌峰书院都堪称全省教育灯塔，隆誉声望直达海外。

光绪二十八年，鳌峰书院改办为“福建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改为“校士馆”，后毁于大火。盛于国家承平，止于天下板荡。当年如雷贯耳的振海潮音，留与后人评论遐思。

(林丽钦/文 韩惠彬/图 来源：《闽都文化》)